

贵州

舞

狮子

贵州彝学研究之
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彝学研究（之一）

贵州彝学

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首届彝学科研成果评奖获奖论文选集

余宏模 安文新 李平凡／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61410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龙 婴

贵州彝学研究(之一)

余宏模 安文新 李平凡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地质彩印厂印刷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260千 印张: 10.5

印数0001—1000册

ISBN7—5412—0334—3/Z·26 定价 4.50元

目 录

余宏模	彝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代序)·····	(1)
禄文斌	金国藩 毕节地区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简论·····	(25)
黄美贤	六盘水市的经济的发展及其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36)
易康交	彝族古代自然科学简论·····	(43)
陈 英	彝族科技史上的火花·····	(53)
龙正清	彝族数理初论·····	(70)
陈永珩	《宇宙人文论》中关于经络记述管见·····	(90)
王正贤	彝族唢呐大宗初探·····	(97)
史继忠	罗殿国与安札遗址·····	(120)
李平凡	贵州安顺古代彝族与安札古遗址·····	(133)
李 卿	试论明末“奢安事件”的性质·····	(149)
东人达	一场震撼明末反动统治的民族起义·····	(162)
罗 勇	普安彝族十二营考·····	(171)
赵国相	兴仁野藏一带彝族源流初考·····	(180)
庾修明	浅论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	(186)
席克定	记录彝族先民生产活动变化的活化石—威宁板底 傩戛彝族“撮泰吉”活动的民族学意义·····	(202)
陈世鹏	彝族火葬文化管见·····	(222)
王继超	黔西北古乌撒部彝族“向天坟”调查·····	(235)
安文新	试论彝族神话与宗教·····	(253)
卢春樱	彝族民风民俗中的道德观试论·····	(262)
陈光明	《洪水纪》与彝族先民天神观念的动摇·····	(270)
那建坤	屈原《天问》与《彝族源流》·····	(276)
安尚育	苏晓星论·····	(284)

罗天才	李开荣	浅谈彝族神话传说的审美特征·····	(296)
陈英俸		浅谈彝族民歌中的比兴·····	(301)
方家印		浅谈彝族传统舞蹈〈阿买戚托〉的命名·····	(318)
		附：贵州省彝学研究会首届科研成果评获奖名 单·····	(321)
		后记·····	(329)

彝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代序)

余宏模

彝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是西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云南有彝族410多万，遍布全省各地，而以哀牢山区、红河流域和滇北小凉山区较为集中。解放以来，建有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宁蒗、峨山、路南、南涧、景东、漾濞等6个彝族自治县和寻甸、新平、元江、江城、巍山、景谷、普洱、禄劝等8个彝族与其他民族的联合自治县。四川有彝族170多万，主要分布在川西南的大、小凉山地区及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县，现建立有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峨边、马边两个彝族自治县。贵州有彝族70多万，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山区，现建有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有彝族近万人，主要分布在隆林各族自治县和那坡县。

彝族又是一个跨国境而居的民族，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境外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主要是缅甸、老挝、越南、泰国，还有10多万彝族。在缅甸有彝族10余万，分布在掸邦东部边区；在泰国有彝族近万人，居住在龙谷河和莫河之间地带。在老挝有彝族1万多人，住在乌涅亚和孟格涅边界地区。在越南有彝族4千多人，居住在北部靠近中国的孟康、保乐等边沿县，据彝文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他们均是在我国唐朝中叶以后陆续迁徙到国外去的。

彝族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历史悠久，对伟大祖国的缔造有着重

大贡献：彝族人民创造的光辉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份。广大彝区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但在旧中国彝族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可以说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因此，加强和提高彝学研究水平，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和发展中华彝学而努力奋斗，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彝学研究的传统

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优良的历史和学术传统，彝族又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关于彝族及其先民的记载，很早以前就出现在我国的汉文典籍上。最早记载彝族先民情况的，首推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汉初著名的学者司马相如曾奉使至邛都地区（今凉山一带），司马迁也曾“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关于彝族先民的记述，保存在《史记》有关列传中。此后历代的正史、别史对西南彝族，包括贵州彝族的情况均有记载。历代的地方志中记载彝族情况的首推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与唐人樊绰的《云南志》（亦名《蛮书》）。这两本书详细记述了当时彝族及其有关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种情况，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是研究当时彝族问题的重要依据。元、明、清时期记述彝族的书籍更多，除地方志如元人李京《云南志略》，明、清时川、滇、黔、桂的多种省志和府、州、县志外，尚有杂史、杂著、杂录多种。其较著者有明代《土官底簿》、明人谭希恩《土夷考》、明人倪輅《南诏野史》、明人杨慎《滇载记》、清人毛奇龄《蛮司合志》、清人何东铭《邛崃野录》等。记载贵州彝族历史的有明人田汝成《炎徼记闻》、明人郭子章《黔记》、《青螺文集》、明人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明人刘锡玄《黔牂偶存》等。

但是，对彝族进行系统的研究则是近代的事。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先生提出《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倡导对我国的国土开发，其中涉及对我国西南彝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铁路建设计划。同时，帝国主义此时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已，于是开发祖国西南和西北以抵制列强侵略的舆论在全国蓬勃兴起。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有识之士与知识界逐渐把视线转移到了边疆和民族地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沿海相继沦陷，祖国西南和西北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西南和西北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自然成为国家的注意重心。祖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彝族的人口又居少数民族的首位，加之在旧社会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问题突出，因此，对彝族的研究就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1911年我省彝族辛亥革命先驱安健前辈，就在《地学杂志》二卷十八期发表了《贵州土司现状》一文；1928年9月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四卷四十四至四十五期上发表《贵州民族概略》，向国人率先介绍了贵州的民族概况，包括彝族状况。1912年四川都督府派员赴小凉山彝区调查，并于当年出版《峨马雷屏边务调查表册》。1920年8月曲木藏尧等在《新亚细亚》二卷五期发表《罗罗民族之要求》到1923年5月在《方志周刊》七卷四期又发表了《西南国防与保夷民族》。1933年云南省昆华教育馆编印《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同年，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出版《西南夷族考察记》（曲木藏尧编）。1935年，旧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派员赴马边、雷波小凉山区调查（有徐孝恢教授等参加）。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营，派出“边政设计委员会边区调查团”30余人，由雷波往西昌，在大小凉山调查（有常隆庆教授等参加）。此后于1939年出版《宁属调查报告汇编》。1937年，旧四川省建设厅编印《四川西南边区雷马屏峨昭五县垦牧调查报告》。1939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发表《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对西昌、昭觉、冕宁“夷务”提出“视察报告”（黄炎培先生根据当时视察彝区所见，写入所

著《蜀南三种》，于1941年出版）。1941年，旧西康省政府出版《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庄学本著）。同年，旧四川省政府出版《雷马屏峨夷务鸟瞰》、旧四川省教育厅出版《雷马屏峨记略》，系该厅所派边区施教团考察四川小凉山区所搜集的资料（有柯象峰教授等参加）。1942年，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该委调查室所编《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云南边民录》。1947年，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大小凉山之夷族》。上述调查研究，主要是根据旧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需要出发由官方组织的，且限于当时条件，故调查不可能深入，而观点也不见得正确。但这些资料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彝区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就其资料而言，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不少学术团体与学者亦相继进入彝区进行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宝贵资料。彝族知名人士岭光电先生于1925年7月《新夷族》一卷一期发表了《西南彝族史》，此后又有《俚情述论》一书于1942年问世。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学者考察大小凉山的民族、人文、地质、动物和植物，次年出版《雷马屏峨调查记》。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从西昌至雷波沿途进行考察，此行有马长寿教授等参加，考察团有报告问世。1941年，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调查团考察凉山彝区，团员曾昭伦教授著有《大凉山彝区考察记》于1943年出版。同年，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由林跃华教授率领考察彝区，林氏著有《凉山彝家》于1947年出版。此外，不少学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身深入彝区考察，并写出专著，较著者有杨成志关于彝族的调查《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1934年），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之罗民》（1943年），任映苍《大小凉山俚族通考》与《大小凉山开发概论》（1947年），江应梁《凉山夷族的奴隶制》（1948年），马学良《云南俚族之神话》（1942年）等。

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至1949年，关于彝族研究和调查的专著有50余种，论文有100余篇。这些著述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彝族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情况、经济生活、政治组织、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但总的说来，此中除少数问题研究得较为深入外，多数尚停留在介绍叙述或研究的初期阶段。

同时，对西南彝族的研究，由于凉山彝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且所处的位置在川滇两省交通要冲，又加以当时处于奴隶制阶段，故凉山彝区的调查研究又成为整个彝族调查研究的重点。

（二）新中国的彝学研究

新中国的成立为彝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彝学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党和政府在制定彝族地区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时，也需要彝学研究者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作为依据。

建国初期，为了贯彻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遇到的就是彝族的民族识别问题。众所周知，彝族居住的地域广阔，支系繁多，自称与他称均不相同，社会发展水平亦不很一致。如此众多的称谓，究竟是同一民族的支系？或是不同的若干民族？这在未经过民族识别的调查以前，是不完全清楚的。因此，在本世纪50年代初期，在大批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参加下，主要在云南进行了这一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终于弄清了彝族这一整体的民族构成，据调查，仅云南彝族的自称就有37种，他称有44种。此外，还有侮辱性称谓多种。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民族内部的协商，废除了侮辱性称谓，将同一民族的各支系统称为彝族，从而为各地彝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不仅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也是彝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存在的奴隶制度虽然早为中外人士所共知，但这种奴隶制究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占居主导地位，以及它到底有何特点？这在解放以前是不甚清楚的，且在学术界对此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判明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就成为解放初期开展彝族工作所必需。为此，大批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从50年代初期即已投入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多次调查与学术讨论，大多数意见已趋于一致，确认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属于奴隶社会，而这一奴隶社会又具备着它自身的若干特点，既不同于希腊、罗马古典的类型，也不属于古代东方的类型。1956年，党和政府根据大量的凉山社会调查资料，制定了特殊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民主改革的胜利，彻底废除了落后的奴隶制，事实证明了调查成果的正确性。1956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少数民族的诸种社会形态，在全国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迄至“文革”以前已对彝族的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形态，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都作了详细的调查。调查报告已铅印的计：四川方面22本，云南方面3本，贵州方面3本，广西方面1本。同时还继续进行凉山彝族社会形态的探讨，有关论文已汇编成《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倡议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已于1982年出版。同时还有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于1985年出版，周自强《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亦同时出版，体现了此项调查研究的成果，成为对凉山彝族研究“科学大厦的奠基石”，对丰富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

彝族历史悠久，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诸如族源问题、各支系的迁徙与发展问题、阶级社会的起源问题、社会发展史的分期问题、元代设置的流官与土官的关系问题、明清彝族社会的演变问题、近代彝族社会的变迁问题、凉山奴隶制长期延续

的原因问题、还有彝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建国以来，许多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文。目前对有的问题已有一致的看法，但大多数问题意见还相当歧异。这主要由于关于彝族的史料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汉文资料着重于政治、军事方面，而又系统的整理汇编不够；彝文资料翻译出版不多，且过于简略，注释考证以及在时间与空间概念上又不甚详细所致。目前，彝族史已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方国瑜《彝族史稿》、马长寿《彝族古代史》、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以及由国家民委《五套丛书》编委布署由集体编写的《彝族简史》等，为彝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南诏史是彝族史的一个重要部份，也取得相当进展，在史料方面，自向达的《蛮书校注》、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出版后，又有赵吕甫《云南志校释》、马长寿《南诏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等书，根据调查史料，为探讨南诏历史问题，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此外，近年以来，何耀华《武定凤氏本末笺证》、蒙默《凉山地区彝族古代史资料》、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徐铭《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余宏模、史继忠、陈国安《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余宏模《明代贵州彝族历史资料选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选》的相继出版，为研究彝族的历史系统整理积累了一批史料。

对贵州彝族历史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近年以来，对罗殿国或罗施鬼国、对明代水西彝族社会性质、水西则溪制度、清代彝区改土归流和社会变革、贵州彝族历史人物评价、贵州彝族文物研究等，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已由余宏模、柏果成选编，贵州民族学院铅印《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集中反映了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研究彝族历史人物的专著，除了被台湾特务人员杀害的江南

先生在国外出版的《龙云传》外，近年来谢本书《龙云传》和《卢汉传》亦已在国内出版。而需待撰写的历史人物，为数尚多。

彝族地区的考古，在解放以前可说基本是个空白。建国40年来彝区考古田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云南楚雄彝州元谋猿人和东方人的发现，贵州黔西观音洞、水城硝灰碕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彝区在远古即有人类栖息。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的发掘，再次证明了这一问题。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0座墓葬表明：这种相当于春秋中期而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遗存，已处于高度的青铜文明阶段。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群出土的文物，说明彝族先民在西汉时代已成为“滇国”境内的一种民族。滇东昭通后街子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中的壁画所描绘的“夷汉部曲”中的“夷部曲”形象，与今日凉山彝族极相类似，说明他们极可能是今日彝族的先民。在四川，汉源富林古文化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而西昌礼州遗址则是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在安宁河流域，有相当于战国至秦汉时的大石墓的发现，在昭觉山区还有与此时期相当的另一种石板墓的出土。昭觉四开坝出土了东汉延光年间的石阙、石表，以及这一带大量汉墓的出土，说明汉代这一带已有大量的汉民居住。昭觉碗厂乡博石瓦黑发现的石刻画属于南诏晚期或大理时代，是当时贵族的生活写照。在黔西北乌蒙山区，毕节青场新石器遗址、赫章可乐新石器遗址、威宁吴家大坪新石器遗址的发现，说明滇黔毗邻的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在远古即有人类居住。赫章可乐古墓群和古遗址、威宁野鸡河古墓群、辅处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提供了探讨夜郎文化的实物史料。明代彝汉铭文成化铜钟、大渡河桥万历壬辰彝文碑在大方境内的发现，加上过去发现的《千岁衢碑记》彝汉文岩刻，为研究明代水西彝族社会和彝族文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从威宁境内流入昭通传世的彝文“以诺”印章，和近年发现传世的彝文“堂琅”虎纽

铜印，安顺彝族安札城遗址的发现，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上述种种考古发现，说明西南彝族地区，自远古以来即有人类居住，在其后的时间里也一直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这些遗址和墓葬是古代滇人、邛人、昆明、夷人、濮人、汉人的历史遗迹，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各民族的先民共同开发西南彝区，考古发现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

对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自建国以来也取得了很大成就。50年代初期出版了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和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二书。建国初期着手调查彝族语文，1956年组成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负责这一工作。经过调查，基本弄清了彝语情况。彝语计分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和东南部6种方言，方言之下又分5种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分24种土语，土语之下又分19种次土语。这样复杂的语言情况是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的状况相一致的。彝语方言、土语之间差别较大，但语法与词汇基本相同。对彝语的研究，已出版有《彝语简志》、《彝语概况》、《凉山彝语语法》等书。对彝文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经过调查研究，认识到川滇黔桂的彝文在最初无疑是一种统一的文字。但由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彼此分离与其他民族杂居等原因，致使彝文结合各地方言的发展，产生地域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书写形式上，也表现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滇川黔桂彝族文字对比研究》、果吉宁哈《论滇川黔桂彝族文字》、贵州和云南各地编写的《彝文字典》、《彝汉简明词典》、四川编写的《彝文检字法》、《彝汉词汇》、《汉彝词汇》等工具书。近年来，对彝文的起源和类型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意见并展开了讨论，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已收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选编，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彝族语言文字论文选》一书。

（三）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

近几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再次形成了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潮，学者们从各个历史角度，广泛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当国内有一股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逆流甚嚣尘上之际，中华彝族文化学派这支学术新军却崛起于中国大陆，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楚雄彝州为了进一步落实民族文化政策，于198年毅然决定成立彝族文化研究室，1984年又升格为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化研究所，聘请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籍的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国内外知名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刘尧汉同志兼任该所所长。在州委、州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刘尧汉教授不拘一格地培养青年研究人员，亲自率领他们常年往返金沙江两侧的川滇黔三省彝区，脚踏实地，调查研究，深入群众，接触实际。经过千里长途跋涉，数年艰辛努力，一批批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主要成果集中地体现在由刘尧汉教授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之中。彝族文化学派以1984年出版的《彝族天文学史》（刘尧汉、卢央、陈久金著）开其先河，这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天文历史著作，它奠定了彝族文化学派资料与论证基础，以不同凡响的面貌呈现于学术界。接着是1985年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和1986年他与彝族卢央教授合著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二书的出版，成为彝族文化学派的奠基石。1987年由刘尧汉教授培养指导的彝族青年研究人员，现任该研究所副所

长杨和森的《图腾层次论》、和1988年龙建民《市场起源论》也相继出版。1989年又出版了彝族著名人士岭光电先生的回忆录《忆往昔》和卢央教授的《彝族星占学》。1990年出版了吉克·尔达·则伙《我在鬼神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和刘小辛的《母体崇拜——彝族祖灵葫芦溯源》。这套丛书还将继续出版下去，已列入项目的有：《彝族虎星占的哲学和科学意义》、《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彝族哲学》、《彝族火神话与中华火文化》、《凉山彝族父系氏族奴隶制土地租佃关系典型研究》、《现代系统论的历史渊源》、《彝族沙村五百年》、《彝族禄村今昔》、《凉山曲涅部落曲木氏族史》、《凉山古候部落什列惹古氏族史》、《贵州乌蒙山龙场驿祭司世家》、《云南凉山祭司海惹巴瑙回忆录》、《川、滇、黔凉山彝族古候部落金古氏族世家》等等，计划出版30本至50本。此外，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于1984年创办《彝族文化》年刊，现已出刊6册，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还编辑公开出版了两本《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从各个方面对彝族的文化史，民族史，哲学史，科技史，以及经济发展等现实问题，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发掘研究。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从科技史研究入手，进而打开了彝族文化及中国文化的研究大门。它在方法论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它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文献、考古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以纵横交错的座标式体系，在时空上，跨越近万年，驰骋国内外。不仅探索古代历史，而且还研究现实社会，既发掘彝族和中国本土上的文化遗产，同时追溯了当代国外某些学说的渊源。所以，丛书的社会历史氛围是相当丰富多彩的，由此所产生的的是既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丛书的内容不但涉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技、宗教、考古，将形成彝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又开拓出一

些意义重大的带有综合性与边缘性的研究专题。比如从伏羲八卦研究了系统论、从《易经》研究了未来学，从原始的“十二兽”纪日集场研究了现代市场，从彝族向天坟研究了现代新兴科学考古天文学等等，使已出版的著作均有综合性与边缘性的特色。

特别要指出的是，彝族文化学派的这种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即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所称的“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是刘尧汉教授始终一贯坚持的方法。也是他在学术研究和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在研究成果上取得突破的一大法宝。

所谓“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具体地说，就是“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活资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刘尧汉：“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30多年前，刘尧汉教授青年时代写的一篇论文《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是他对自己所出生的奴隶主家族史前后作了10年调查研究的成果。它解决了国内外史学家都存在的一个悬而未解的难题，即奴隶制生产方式究竟是如何向封建生产方式过渡的？这篇论文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发现，特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称赞这篇论文是他最喜爱的论文之一。它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乎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范老同时针对当时史学研究工作中的一种不良倾向指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希腊、罗马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他介绍一下……和吉士们会面”（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